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思想的演进历程与时代镜鉴

蔡枝云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01)

摘要: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回溯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全民抗战的胜利,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 统一全党思想, 通过规范党内思想、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和动员、促进革命理论通俗化、开展作风整顿等途径, 凝聚思想、汇聚民心, 确保党在抗战时期的领导力、战斗力与威信力。深刻总结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启示, 有助于在新的时代征程上激发磅礴奋进的力量、筑牢广泛的社会共识。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 统一思想; 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重视思想建设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坚持的光荣传统, 体现了党的先进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 使党员、干部补足精神之钙, 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1] 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 中国共产党在面临民族危机, 抵御外敌入侵的艰难时刻, 还要应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 开展思想建设事关革命的胜利和党的政权巩固。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建设核心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通过创办学校进行教育学习, 利用报纸开展思想宣传等形式, 统一全党思想, 确保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思想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时期是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 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际, 救亡图存成为全体中国人的使命。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 党内党员队伍迅速壮大, 但党员成分的广泛性使得党内思想呈现多元化。加之党内曾受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影响等, 部分同志还存在思想误区。基于多重因素, 加强思想建设, 让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抗战实际结合成为亟需进行的任务。

(一) 民族危机与统战需要

民族危机深重, 建立统一的抗日战线成为党加强思想建设的时代动因。局部抗战阶段,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等先后接连爆发, 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之时, 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之际, 中国共产党率先转变思想政策。1935年,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 毛泽东明确指出“目前的时局, 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 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 这成为中国共产党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重要标志。^[2]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 全面抗战爆发, 民族矛盾上升为当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建立一致对外的统一战线刻不容缓。7月15日, 周恩来等人在庐山谈判时, 向蒋介石提交以团结抗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宣言提出三大纲领, 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四项保证, 以光明磊落的立场凝聚抗日共识。同年9月, 蒋介石发表谈话,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努力，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筑牢基础。

国民党军事进攻和舆论压迫试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始终反共企图。尤其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开始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后进行三次反共高潮。针对这一严峻形式，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策略，以思想共识巩固统一战线。根据国民党确立的反共方针，1939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警示全党反对投降分裂的危险。1939年7月，党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提出了团结抗日的三大政治口号，成为凝聚抗日的意识的精神旗帜。同年9月的《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为应对国民党军事进攻提供思想遵循。对于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和思想污蔑，党开展有力反击。面对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造谣抹黑，中国共产党于1941年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揭露国民党的行径，同时通过《新华日报》等传播真相，打破舆论垄断。1943年，国民党趁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际，叫嚣“解散中国共产党”，并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法西斯主义，毛泽东撰写了《质问国民党》，批驳其反共的谬论。1943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坚定了全党团结，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信心。党政策的及时调整，有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定。

（二）党内思想多元化的挑战

时代任务明确了思想建设方向，而党内思想状况凸显了建设的紧迫性。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泛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扩充抗日力量，党员人数激增。根据相关文件，晋察冀根据地党员人数爆发式增长，1937年的党员人数仅有几十人，而在1938年竟达到的10460人，晋中、冀西两区一年内党员人数由几十人增加至8000多人。^[3]平山小管区曾一周发展500多名党员，阜平一个人一天发展60名党员。^[4]新党员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他们虽然革命热情高涨，却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各种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如1938年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刘立功，在抗战的关键节点，拒绝党组织安排，甚至以退党作为要挟坚持要求进入马列学院或者回到原籍工作。这种贪图安逸的个人主义也极大影响了党内其他党员，抗战期间，党组织精心挑选东北籍的党员干部返回家乡开展敌后地下工作，然而，干部受党内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害怕吃苦、逃避风险，找借口推脱。党内充斥的私利主义思想严重破坏了党的纯洁性和在群众中的威信力，如果不及时纠正，则会阻碍革命进程和党内团结。

党内干部思想受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以及宗派主义等的侵蚀，不仅危害党的领导，还阻碍了抗日工作的进行。首先教条主义照搬理论和经验，比如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有些缺乏实战经验的干部将地图和理论作为指挥作战的依据。1938年3月，129师计划在神头岭伏击日军，然而缺乏实战经验的参谋人员仅仅根据军用地图，就判定公路在山谷沟底，两侧险峻，

制定了依托两侧高地设伏的方案。其次是主观主义盛行。“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5]812-840} 主观主义脱离客观实际，使认识与实践相分离，抗战中期晋察冀某根据地部分干部不调研农民收成差异和遭受旱灾粮食减产的实际情况，仅凭借“抗战需要大量物资”的主观判断制定征粮政策。而宗派主义是以个人或者小团体利益为核心的行为，党内部分人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自成一派。这些思想损害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干扰了党的统战和抗日工作，必须要进行思想建设及时改造思想。

（三）理论本土化的迫切性

抗日战场的具有复杂性，应对多变的形势，推动理论本土化刻不容缓。抗日战争时期不仅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如何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共产党采取一系列举措，如开展理论当前运动趋势的研究。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到“必须着重地致力并解决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需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6] 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因此，党需要加强思想建设，统一全党的战术认知，把马列经典著作中关于游击战的理论进行适合抗日战争实际情况的本土化创新。

统一党内思想不仅是为了赢得战争胜利，也是为了抵御敌对思想势力冲击。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除了党内，还有党外，主要集中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国民党的歪曲思想。日本侵略者通过建立“宣抚班”“新民会”等机构推行奴化教育，在华北沦陷区要求学生背诵日本“教育敕语”，向天皇肖像行礼。国民党宣扬马克思主义只适用发达国家，并且污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其篡改。此外，蒋介石将三民主义儒家化，试图用假三民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必须进行思想建设，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理论为核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进行反击，让民众了解奴化思想背后的本质，自觉抵制奴化思想的侵蚀。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与国情分析方法驳斥国民党歪曲理论，让百姓看清国民党的虚伪，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适配性。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思想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国家危亡的严峻形势和党内党外各种思想的冲击下，开始了思想建设的伟大征程。这一征程上，党的思想建设以凝聚和团结广大民众的抗战合力、巩固党的自身建设为目标，以规范党内思想与主张、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方向，在抗日的不同阶段通过思想动员、作风整顿、理论构建等方式，确保了党在抗战时期的领导力、战斗力与威信力。

（一）思想动员：从洛川会议到《论持久战》

思想建设离不开思想动员来凝聚共识。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全国军事和人民总动员等纲领、划清与国民党单纯依靠军队的

片面抗战路线的界限。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批驳了引起人们思想混乱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坚定了全党持久抗战的信念。六届六中全会，基本克服纠正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明确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牢固党内抗战路线的共识。同时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号召摒弃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神圣化倾向，强调实事求是。以思想引领动员群众。党员干部亲自下乡开展动员工作，如1940年刘少奇深入乡村，到苏北盐阜区组织民运工作队，通过借粮、减租减息等惠民措施，赢得佃农信任。《群众》周刊、《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党的重要期刊在讴歌八路军战绩、亲民政策的同时，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和国民党的伪政权本质，让群众清晰认识到党的主张。

理论宣传与艺术宣传相融通，推动抗日思想入基层。一是戏剧宣传。抗战初期在陕甘宁已有2000多支宣传队，其中基层宣传力量的典型代表之一是胡林贵带领的儿童宣传队。该队开展下乡宣传，在演出的剧目中融入民族危机与团结抗战的观念，以通俗易懂方式扩大抗战的宣传的覆盖面。其他剧团，如抗日人民剧社，表演紧扣抗日救国这个主题，将团结抗战融入戏曲，使其深入人心。二是传单与标语宣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铲除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抗日标语成为民众一致呼声。边区同时也印发关于抗日救国传单，晋察冀等根据地还制作双语传单，一方面向群众传递团结抗日，另一方面用于揭露日军侵略本质。三是漫画与歌曲宣传。著名漫画家丰子恺根据见闻创作许多震撼人心的漫画，如《小主人的腿》，《轰炸·广州所见》等展示战争惨状。许多耳熟能详的抗战歌曲，如《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迅速传播，激发参军热情，引得无数青年投身抗日队伍。这些文艺宣传方式，鼓舞了抗战士气，极大增强了思想凝聚力。

（二）思想整顿：整顿三风

党内思想的规范统一，离不开作风建设的有力支撑，整顿三风的开展为其提供了实践抓手。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党内不根据中国革命实际，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提出“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他推动出版了《农村调查序言》，倡导“眼睛向下”的调查研究路径以破除主观主义。同年8月，党中央成立调查研究局，全党掀起调研热潮，以制度化调研根治主观主义。同年9月，《解放日报》刊发了文章《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认为调查研究是思想革命的动员令，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1942年2月，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明确了学风是整风的中心任务，并推动“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党内的深化传播。1942年至1943年的中国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针对学风层面纠正了干部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思想倾向。在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内的主观主义，肯定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风成果，在思想上彻底肃清了主观主义的荼毒。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针对宗派主义违背民主集中制、党员闹独立性的问题，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党员杜绝拉帮结派、派别斗争、独断专行等的宗派行为，严守“四个服从”，为破除党内的宗派主义提供制度约束。同时，党中央倡导党员干部学习《反对自由主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引导党员干部摒弃“任人唯亲”“妄自尊大”的宗派作风，树立党性观念。1942年中央党校成为整风的重点单位，通过教学内容的调整、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干部中存在闹独立性、本位主义的宗派思想。在整风期间，陕甘宁边区针对部分党员对非党员的傲慢态度，采取邀请民主人士参与政务决策听取意见的方式，如1941年“三三制”原则，1943年西北局邀请党外人士召开座谈会，1944年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分区邀请党外人士召开座谈会，倒逼党内摒弃“闭门造车”的宗派作风。整顿党风，有效克服党内的本位主义，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全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空前团结。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2年2月，毛泽东作了《反对党八股》报告，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其本质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5]1942年4月3日，发布的“四三决定”，将反对党八股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内容，要求各单位检查文件、讲话、指示中的党八股残余，为整风运动作了系统部署。党的主流媒体，如《解放日报》改版，践行文风革新，摆脱八股文束缚，一改以往脱离群众的理论空话，倡导记者深入群众之中挖掘群众百姓能看的懂，也喜欢看的新鲜素材，以生活化的口吻撰写基层故事。此外，文艺领域也掀起文风革新运动，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明确了文艺的方向是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响应号召深入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改造思想，涌现出《兄妹开荒》、《白毛女》等贴近群众的作品，改变此前脱离群众现实的创作。通过全方位整改，逐步破除党八股对思想传播的束缚，实现了文风与实际、与群众的深度结合。

（三）理论成熟：从《新民主主义论》到七大

1943年的下半年，延安整风运动转入到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阶段，中央编写印刷《两条路线》等相关学习材料，党内高级干部近1.2万名开始党史学习。同时党中央专门召开专题座谈会，参加过不同阶段革命的干部们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革命实践进行总结复盘。1944年，毛泽东作了关于《学习与时局》的报告，提出干部要以辩证的视角总结革命经验而不是片面否定历史，使党内对中国革命必须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提供指引。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问题的历史决议》延续之前对党史的学习，系统梳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的历史脉络，不仅清晰列举“左”倾和“右”倾主义错误在党内的表现和危害，而且深刻分析错误的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彻底结束党内长期存在的路线争议，同时也让党内高级干部在“中国革命需要结合国情”这一个重要核心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

理论体系构建逐步系统化构建标志着思想建设不断走向成熟。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和实践被证明为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正确的理论。1943年7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中，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概念，将其阐释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即引发得到广泛反响。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的共产党的方向。”^[7]朱德强调“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8]党内掀起学习热潮，将各种报告中的观点和实践中的思想整合成系统的理论，党的思想朝着体系化成熟迈进。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在党章中被明确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立足中国革命实践、融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结晶，得到全党一致公认与遵循。党的思想达到空前统一，也为党后续的思想建设提供成熟的范式。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思想的时代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在一系列重要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这些成就不仅夯实了党的建设根基，同时为党后续思想理论的探索与发展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功启迪我们，始终如一加强理论教育学习，始终如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如一推进思想理论创新，使党的思想永垂不朽、焕发光芒与生机。

（一）理论教育：常态化学习机制建构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回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历程，正是在对马列经典著作与毛泽东著作精读中，在让理论学习服务于抗战实践的认知中，筑牢了抗战胜利的根基。新时代的思想建设要继续延续抗战时期理论育人的核心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学习的核心，领会和把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洞察时代发展大势、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在复杂的情形中找准方向。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9]构建马列经典著作原理与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案例相结合的立体化学习框架，让理论学习常态化、多元化。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的本质属性，理解“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永无止境”的深刻内涵，掌握“以理论破题、以实践验理”的思维方法。”^[10-11]真正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探寻中国发展进步的驱动力，从中国发展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坚守理论立场的同时，树立立足于时代，服务实践的格局。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方法论价值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灵魂，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思想和工作方法。抗日战争时期的实践印证了实事求是是攻坚克难，校正思想偏差，找准前进方向

的法宝。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12]新时代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挑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等弊病，必须把实事求是贯穿思想建设的全过程，杜绝思想上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摒弃“重面子，轻里子”的错误认知，跳出“本本主义、经验主义”的桎梏。以“求真”的态度破除认知偏差，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维自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秉持务实的作风，务实的作风是贯彻实事求是的关键支撑，“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奉行“干是当头的”的理念，坚持谋事须求实，创业当务实，做人应诚实。强化实践导向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新时代的思想建设要把实践作为检验成效的标准，以实践为标尺，确保思想建设在与时代同行、与实践互动中不断焕发活力。

（三）理论创新：两个结合的实践路径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危亡的历史关头，以理论创新破解革命难题，汇聚民族力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新时代的思想建设离不开理论的创新，推进理论创新必须牢牢把握“两个结合”的根本途径，“两个结合”做得越好，理论创新之源就越丰富，理论创新之力就越强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3]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赋予理论鲜明的中国底色，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赓续优秀文化根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让理论创新的种子扎根中国土壤，确保理论创新不偏离科学真理与文化根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战时环境与群众认知，使用戏剧、漫画、快板等形式传播革命理论。“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14]新时代，要立足新的时代特质继续创新理论传播载体和宣传阵地，锚定载体创新方向、聚焦内容本质、贴合群众需要，使党的思想理论生活化、具象化、深基层，让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人民群众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创造力，理论创新的根基在人民、动力在人民、归宿在人民。新时代推进思想创新，要把人民的诉求作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把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作为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把服务人民群众作为理论创新的落脚点，使理论创新始终与人民群众的实践同发展、与时代共进步。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197.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3.
- [3] 谢忠厚，肖银成.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M].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70.
- [4] 彭真. 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142.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12-840.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33.
- [7] 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340.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M]. 中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1105.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875
- [1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务委员会. 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笃信笃行者[N]. 学习时报, 2025-12-03(001).
- [1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644.
- [12]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3-12-27(02).
- [13]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5
- [14] 习近平.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R].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4.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Unified Though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Its Contemporary Relevance

Cai Zhiyun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Thought is the precursor of action, and theory serves as a guide for practice. Looking back at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one of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the victory achiev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s a whole was the emphasis placed on the Party'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war effort, unify the Party's ideology, promote popular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theory, conduct ideological rectification, and mobilize the masses through various means, such as standardizing Party ideology, engaging in extensive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efforts, and fostering a sense of unity and shared purpose among the people, all of which ensured the Party's leadership, combat effectiveness, and prestige during the war.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Party's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can help unleash powerful momentum and build broad social consensu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Unified Thought; Lessons Learned